

作为文学认知策略的另类叙事

——以《宠儿》中的赛丝杀子为例

于 雷

(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 另类叙事作为极端化或非常规化的文学表征形式往往会造成阅读过程中作者编码意图的缺位或扭曲, 进而无从准确揭示作品当中所包含的整体认知图式。本文选取莫里森的经典小说《宠儿》, 对文中赛丝杀子这一另类叙事加以聚焦, 以说明文学中的极端叙事表征形式并非只是出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性关注, 相反, 它旨在通过刻意偏离常规的脚本认知规约以实现作品的深层编码预期。

关键词: 认知策略; 另类叙事; 莫里森; 《宠儿》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46(2011)02-0082-06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西方人文研究逐渐对认知科学的日趋重视, 认知诗学作为一种跨学科发展模式为文学领域内的探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虽然近年来国内的学者也在陆续将西方文学认知研究领域的新老成果译介到国内, 但绝大部分仍属理论推介, 与文学批评本身的关联并不紧密, 还远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认知实践。不仅如此, 即便是活跃在认识诗学前沿的西方学者本身也存在理论上的偏颇之处。申丹教授曾颇为敏锐地指出, 不少认知叙事学家在关注读者认知的时候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 即忽略作者在构建规约性认知脚本过程中所起到的编码作用。^[1] 笔者以为, 这一观念对于文学认知研究来说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因为它强调将作者的叙事编码功能考虑在内, 从而使得文学认知研究真正成为作者、文本和读者这三方面协同合作的批评有机体。

从定义的角度来看, 另类叙事目前似乎并未在学术界形成某种共识。而且, “另类”一词还可能被那些注重意识形态批评的论者“抓住小辫子”, 认为它带有政治批评的意向性。但是, 问题在于, 几乎所有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之发生均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主体性的影响, 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新历史主义者们利用“另类 域然历史”这一术语时, 显然, 他们的本质意图并非旨在凸出分类上的偏见, 而恰恰是在于让那些受到宏大叙事压制的话语得以归位。从这一意义上说, “另类”一词不仅包含着历史性的真值评价, 更具有政治上的积极内涵。鉴于此, 笔者坚持使用“另类叙事”这一术语去指称文学作品中那些与真实世界逻辑相悖、违反人性常态或背离当下美学理念的极端叙事模态。在中国, 深谙另类叙事之妙的作家不在少数, 为我们所熟知的郁达夫和鲁迅便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代表人物。在西方, 从事另类叙事创作的文人更是枚不胜数, 姑且不论法国的“萨德侯爵”和奥地利的马索克这些“名声远扬”的人物,

收稿日期: 2010-09-07

作者简介: 于 雷 (1972-), 男, 江苏高邮人,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爱伦·坡在中国的接受与认知缺失”(No. 2010SJD740017) 及南京理工大学自主科研专项计划资助项目 (No. 2010ZYTS085) 的阶段性成果。

单看看英美两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我们就能找到劳伦斯·斯泰恩、奥斯卡·王尔德、乔伊斯、爱伦·坡以及福克纳、奥康娜、韦尔蒂等一大批美国南方作家。甚至于像马克·吐温这样“传统”的作家实际上也远比批评家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另类”许多,比如他的短篇小说《山家奇遇》对“催眠认知”的运用即是通过各种催眠化(mesmerized)文本编码策略不断暗示读者,使其在阅读解码预期的实现、颠覆和重构的过程中发现隐含作者的编码意图。^[2]其次,认知叙事学家弗卢德尼克(Fludemik)通过所谓的“叙事化”概念旨在说明,读者在面对缺乏连贯性或难以理解的叙事文本时,往往会采用类似于格式塔认知模式的框架解读去实现最低程度的解码控制。^[3]如果我们借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另类叙事的脚本认知模式,显然是非常契合的。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叙事化”所关注的主要是读者的阅读解码过程,而不是作者的创作编码过程。也就是说,围绕另类叙事,这两种过程常常会陷入不一致的境地。比如,《宠儿》中的赛丝杀子现象很可能被解读为主人公因社会机制的摧残而表现出来的“对尊严和自由的渴望”,^[4]¹⁷²从而忽略了作者所期望实现的其它编码意义。因此,要相对科学地对另类叙事加以认知分析,就必须综合考察作者在叙事编码过程中所提供的各种“文本提示”及其对常规脚本模式的刻意偏离。认知诗学向来重视读者在接受文本过程中的认知体验,但对于另类叙事来说,读者的策略往往由于缺乏传统文类规约的既定脚本而常常陷入阐释的困境。因此,笔者以为,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应当首先依据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凸出以文本提示为特征、相对更具稳定性的创作编码层面,从而就具体的另类叙事建构出相应的具体规约体系。^①而这一过程恰恰能够体现出另类叙事的文学认知功效,即通过非常规的情节设置“迫使”读者对作者的编码程式乃至其价值取向做出更为积极的反应,并最终实现作品的认识论意义。

二

从阅读层面来看,另类叙事往往会对读者提出更为苛刻的解码要求:读者不仅需要积极通过

文本提示去构建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对创作者的编码意图做出元语层面上的思考。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对小说《宠儿》中赛丝杀子现象的误读尤为值得关注。他们(如 Otten 朱小琳)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这一另类叙事纳入到意识形态批评或悲剧美学批评的语义框架之下。莫里森小说中的“恐怖之爱”常常被理解为社会压迫机制下的伦理扭曲,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类规约与阅读解码预期之间的暂时妥协,并因此将《宠儿》当中的母杀子行为视为值得同情的无奈之举。这一见解似乎已成定论,中国的学者也在不断复制这样的阐释。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种阐释方法本身即是充满“暴力”的,因为它抛开了大量存在的文本提示,抛开作者精心设置的叙事编码,进而无法准确理解莫里森在小说中围绕“母爱”这一高度脚本化的认知图式所展开的颠覆和解构。就《宠儿》这部作品中那令人发指的“凝厚”母爱而言,读者在现实世界中的认知定势对传统解读趋向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人类普遍的家庭生活经验来说,父母对子女的身体控制几乎无一例外均(必须)被理解为父母对子女的爱。莫里森本人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暴力或许是对我们良好心愿的一种扭曲……父母—子女关系是最明显的例子。那些一心宠爱自己孩子、并且真心实意地呵护他们的父母事实上有可能毁了他们。”^[5]⁴¹⁻⁴²甚至在西方神学当中,把救赎之爱与牺牲的必要性相联系的做法也是屡见不鲜的。于是,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脚本认知图式与奴隶叙事的传统文类规约之共同作用下,赛丝杀子这一另类叙事便很容易陷入阐释的简单化。

鉴于此,我们不妨看看莫里森围绕赛丝杀子前后所设置的一系列重要文本提示。第一组:1. 赛丝的婆婆巴比·萨格斯在树林中举行仪式,其间,人与树交相呼应,融为一体,显得十分和谐。与此同时,仪式参与者的情感似乎失去控制,开始是嬉笑的孩子、跳舞的男人、哭泣的女人,接着便出现了混杂的局面。女人停止哭泣转而跳舞;男人则坐下哭泣;孩子们跳舞,女人嬉笑……(88)^②; 2. 在同保罗·D就女儿丹佛是否能够自主的问题发生争辩时,赛丝颇为激动地说:“我活

① 这类似于罗杰·尚克在其脚本认知模式中所提出的“计划”(plan)概念,一种用于应对异常情景的认知手段。参见 Roger Schank and Robert Abelson: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77. p 70.

② 本文中凡引用《宠儿》中的部分均出自 Toni Morrison: *Beloved* London: Vintage Random House 1997.

着的时候会保护她,死了也会保护她”(45); 3. 当宠儿的幽灵回到人间愤怒向赛丝索取母爱时,赛丝解释说:“我的计划是把我们大家带到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我自己的妈妈。他们不让我把大伙儿带到那儿,但是他们不阻止你来到这儿。哈哈。你这就回来啦,真是个好姑娘……”(203)。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浓郁的非洲文化色彩。树林在仪式当中的重要角色体现了非洲宗教思想中的自然崇拜。在非洲黑人看来,树是神圣的,而且都有灵魂。^{[6]253}另一方面,仪式参与者的情绪失控同样也体现了非洲宗教的认知方式。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将“疯狂”看作黑人宗教的最重要特点之一,^{[7]138}其内容是非洲人在举行仪式中所要表达的“强烈的宗教情感”。^{[6]379}显然,第一组文本提示的编码功能意在将我们引入非洲宗教的脚本认知图示。在此基础上,赛丝的杀子动机获得了第一层次的框架意义,在非洲宗教思想中,灵魂是人体内部一种独特事物,它可以与躯体相分离而具有永存的性质。灵魂离开肉体,便来到亡者的世界与已故的亲戚朋友相聚。^{[6]259}既然灵魂可以独立于身体之外而成为不朽之物,那么,面对奴隶主的追捕,杀死自己的孩子,“计划”把他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除了非洲文化脚本之外,莫里森还为赛丝杀子设置了另一种更具普适意义的认知脚本——母爱。为此,我们不妨关注第二组文本提示: 1. 在逃离“甜蜜之家”后,赛丝享受到了“自己以前从未体验过的自私的乐趣”——“这是一种我以前从未知晓的自私……我变大了”,“再也不能让这一切回到过去的状态”(162~163); 2. 当“邮资已付”(Stamp Paid)走向赛丝的居所 124号时,他唯一能听到的是“我的”这个词(172); 3. 赛丝: 宠儿“不过是个婴儿”(13); 她“太小了,没法理解”(4); 4. 赛丝:“孩子长大对于母亲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孩子就是孩子。他们身材会高一点,年纪会长一些,但是长大?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我心中,那压根算不了什么”(4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莫里森试图为其“另类叙事”本身提供合理化解释,但她同时也在通过暗示性的反向编码设置力图颠覆先前的认知“规约”,从而大大加深了作品意义的反讽性。比如,“有一、两次

赛丝企图捍卫自尊——成为拥有金科玉律、万事皆通而不容置疑的母亲时——宠儿便把东西弄得砰砰直响,将桌上的盘子横扫在地,把盐泼撒在地上,还打破玻璃窗”(242)。又比如,赛丝:“当我到了这里,当我跳下那辆马车,只要我想爱,这世上就没有我不能爱的人”; 保罗·D(作为回应且带有反讽口吻):“来到一个你能选择爱一切的地方——没有必要为了欲望而要获得许可——行啊,那就是自由”……”;“在 124号她(赛丝)想让孩子们得到的恰恰是那里所缺乏的:安全。”(162~164)

第二组文本提示清晰表达了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赛丝正体验着一种自私的、极度膨胀的母性。在这个意义层面上,赛丝与《秀拉》中的母亲伊娃一样成了家庭的“创造者和统治者”,^①用莫里森的话说,即是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5]64}在 124号,赛丝度过了 28天摆脱奴役的生活,其间,她在努力使自己习惯行使决定权,这是其主体意识在复苏过程中的强烈表达。但是,对于刚刚获得自由的赛丝而言,这一过程却是艰难的:“获得自由是一回事;对自由的自我拥有所有权则是另一回事。”(95)与此同时,人物在身份认识上的问题化直接引发了隐含作者对“权力化”母爱的质疑。就赛丝而言,孩子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是母亲的财产。生命本身并不重要,赛丝的终极目标仅仅是让孩子们呆在身边。^{[8]128}作为极端社会压力下受压迫者所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她的占有欲恰恰成了其应对威胁时所加以“自然化”的认知脚本。在那里,健康的家庭伦理是缺席的。为此,文本中设置了一则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赛丝抱着宠儿的尸体面对奴隶主,“(她的眼睛)由于当中的眼白消失了,它们同她的皮肤一样黑,她看上去像个瞎子。”(150)可以说,传统的脚本认知模式让读者对赛丝那“凝厚”的母爱寄予同情,而莫里森却在部分满足这一解码预期的同时刻意对此模式加以偏离,从而促使读者将母杀子这一另类叙事看作一种特殊的“意义场”,放大我们所熟悉的“母爱”图示,并对其加以重新审视。正因为如此,《宠儿》的文本编码策略成功地将隐含作者的认知脚本与不同人物的认知脚本平等地置于同一叙事空间,鼓励彼此进行对话、对峙和修正。

① 参见 Toni Morrison: *Sula*. London: Vintage, 1998. p. 30.

在《走向修辞性读者反应批评》一文中,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曾围绕《宠儿》的叙事特点阐释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遭遇的三种障碍:(1)困难因素(the difficult);(2)顽固因素(the stubborn);(3)错误因素(the erroneous)。^{[9] 714-715}

第一种因素是可以通过耐心阅读加以克服的,而第二种因素则无法克服,只能被化约为某种积极的功能性(functionality);第三种因素纯属创作过程中细节失误,既无法通过阅读加以克服,本身也并不存在任何积极的功能性。费伦在提及第三种因素时,似乎也并非完全确定,因此,他又单独在文末做了一则尾注,指出,莫里森创作中的“错误”在某些场合也有可能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独特功能表现。笔者在此提及费伦的上述区分,目的在于说明,莫里森独特的文本编码策略恰恰在于体现“权威作者”的自我解构,也就是说,那些难以克服或无法克服的阅读“障碍”在莫里森的作品中有一个总体的“积极”功效,即通过消解作者本身的权威以实现各种认知脚本——人物的、隐含作者的、读者的一一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错误因素”也会在莫里森的叙事艺术当中成为编码过程的一部分。在《宠儿》中,母亲杀子这一另类叙事可以说直接违背了伦理规约下的认知图示,因此,它毫无疑问会使得传统的阅读策略遭遇到费伦所谓的“障碍”。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既定认知模式的颠覆和挑战正是莫里森叙事编码策略的意向所指:文本性话语权威的丧失乃是认知模式得以修正的基础,从宠儿到丹佛到保罗·D再到赛丝,每个人物都在就赛丝的“凝厚”母爱进行脚本的重新建构。但正如上文所指出,这一看似混沌的多维度认知图式当中依然存在着隐含作者所采取的价值立场。

我们发现,莫里森通过各种暗示提出了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即权力体系中所形成的规约性认知模式往往会在个体生存环境中被“内化”,从而得以作用于自身语境中的弱者。应该说,这种压迫机制的“内化”现象在美国非洲裔家庭中是颇为常见的,在莫里森的其它小说(如《最蓝的眼睛》)中,我们都会有所发现。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这种脚本化

的“暴力循环”机制说明,遭到压迫的弱者往往试图在家庭当中“恢复自己的权力感”。^{[10]140}就《宠儿》来说,赛丝对子女的占有欲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奴隶主对奴隶的绝对所有制而得以强化。这不只是一种普通的欲望,而是弱势群体在极端权力化语境中所形成的脚本认知模式。赛丝从自己在种植园所遭受的痛苦经历中认识到这样一条准则,即一个人可以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去捍卫自己的财产。赛丝的母亲因为逃跑而被奴隶主处以极刑,赛丝后背上那块被称作“苦樱桃树”的伤疤、西克索惨遭奴隶主毒打等所有这些记忆均见证了奴隶主对“财产”的绝对控制:“定义属于下定义者,而不属于被定义者。”(190)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从上述文本提示中窥见一斑。跟“学校教师”一样,赛丝成了对弱者的“下定义者”。巴比·萨格斯从自己六十年的奴隶经历和十年自由生活当中获取的教训是,“他们(白人)不知道何时罢休。”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赛丝有着相同的问题;她所引以为豪的“凝厚的爱”在莫里森看来也只是“没有节制”,“一个大问题”和“不知道何时罢休”。^{[5]268}

很明显,莫里森对赛丝的“凝厚”母爱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且,她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像众多批评家那样试图用传统的脚本认知图示去强行规约赛丝的杀子行为。相反,她更倾向于将这一另类叙事当作最极端的实验场地,以观察像“母爱”这种高度脚本化的认知产品当中如何会同样隐匿着权力话语。的确,赛丝对于爱的自由在必要情况下会转变成杀戮的自由。她杀死亲生女儿,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她有权利对自己及孩子的命运负责,有能力单枪匹马对付任何局面,无需别人插手。如有必要,她可以把别的孩子也杀死。^{[11]143}面对奴隶主的追捕,赛丝做出了重大决定:她“计划”杀害所有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另一个世界。而在小说的结尾处,当保罗·D询问赛丝对未来有何计划时,她的回答耐人寻味,“哦,我没有计划。毫无计划。”这个回答戏剧性地映射出赛丝作为人物在伦理观念上的根本转变。作为一种阅读认知趋向,我们对于奴隶叙事文类的规约性情感预期往往会促使我们带着同情心将批判的矛头完全指向外部压迫机制,以确保实现自己与主要人物之间的情感认同。但是,莫里森的高明之处则在于刻意颠覆这样的既定模式。她所

引入的另类叙事将人类思维当中最具规约性的母爱脚本置于传统的奴隶叙事文类之中,并使其问题化,从而让习惯性的阅读策略搁浅。玛格丽特·弗里曼(Margaret Freeman)曾在《诗歌与隐喻空间:走向文学认知理论》一文中指出,认知诗学应被视为“限制文本阐释的一种途径”,因为它能够使文学批评者的分析建立在原型解读之上。^{[12]256}

然而,就赛丝的杀子行为而言,我们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与“母爱”主题相关的原型。在“金羊毛”的神话故事中,美狄亚的杀子行为纯粹是为了报复丈夫另求新欢而实施的(从复仇动机来看,赛丝倒是被赋予了某种原型解读的可能)。正因为如此,认知诗学对阐释的“限制”功能在此另类叙事情境之下丧失了功效,而批评家们也相应地将原本为莫里森所极力关注的问题化“母爱”主题扔进了字纸篓,转而对背景当中的社会历史语境过度地加以前景化,以重新获得对文本的意义控制。有趣的是,这种高度脚本化的认知图式用在《宠儿》的解读当中也是十分“契合”甚至是“安全”的做法,因为奴隶叙事作为一种独特文类所包含的社会批判性规约力量往往是相当强大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作者实际所希望传达的更为重要的文本编码意义。

费伦指出,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不仅是“消极的”,同时也是“积极的”:文本既作用于我们,也为我们所作用……,“体验文本”指的就是这种双向性、多维度及多层次的活动。^{[9]711}可见,在解读《宠儿》当中的“凝厚”母爱时,充分关注文本提示的编码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这是通过“积极”阅读产生正确认知转化的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在赛丝杀子这一另类叙事中,其文学认知意义上的“原型”更接近于帕特里克·霍根(Patrick Hogan)在《思维及其故事》中所提出的“牺牲情节”(sacrificial plot)。霍根认为,以“牺牲情节”为典型特征的叙事通常包含有三个关键人物:叛逆者(the violator)、被触犯的神(the offended deity)以及替罪羊(the scapegoat)。^[13]在《宠儿》中,赛丝显然是叛逆者,奴隶主象征性地成了“被触犯的神”,而宠儿则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文本中的大量提示告诉我们,宠儿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赛丝报复奴隶主的牺牲品。在奴隶制社会中,杀死孩子无疑等同于破坏生产工具)。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赛丝在此“牺牲情节”中具有双重身

份:她在形式上是竭力摆脱压迫机制的叛逆者,但同时又在内容上又是压迫机制规约下的人物类型,也就是说,她在杀子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认知图式恰恰受教于“被触犯的神”,这符合我们在上文得出的结论,即赛丝既是压迫机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压迫机制的“二级”施行者。奥特恩(Otten)在论及赛丝的杀子行为时也承认,“正是在各种繁衍出来的野蛮的社会力量驱使下,很多传统中代表残酷和邪恶的‘能指’堂而皇之地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超常的爱”。^[14]莫里森本人在提到赛丝杀害女儿这一事件之际不无感触地说:在爱的名义下,在爱的幌子下,人们干了各种各样的事情。”^{[5]41-42}显然,莫里森不仅仅旨在揭露美国奴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或暗示读者去同情甚至部分认同赛丝的杀子行为,相反,她更多地是在通过一种极端的另类叙事去帮助我们解构那总是带有“积极”脚本化意义、但却仍为权力机制所侵染的“凝厚”之爱。倘若我们将莫里森的其他重要作品纳入观察视野,我们便会发现,莫里森绝非以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关注的核心——而这恰恰是长期以来批评家们总是难以摆脱的圈囿——事实上,她更为重视的是一切权力社会中人性本身所遭遇的伦理混沌和认知危机,她对社会历史语境的关注不只是为了反思外部权力机制的压迫,相反,她旨在通过各种另类叙事去深入思考人类思维如何对外部压迫机制做出主动的认知接受而却浑然不知。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会发现莫里森其它小说中的“策略性”障碍均变得生动起来。可以说,莫里森文学创作的一大独特魅力即在于她从不囿限于其自身作为黑人女性的独特“政治”身份,相反,她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黑人文学的意识形态规约,将对人类心智的普适关怀置于更具问题意识的另类叙事之中。

参考文献

- [1] 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25.
- [2] 于雷·催眠·骗局·隐喻——《山家奇遇》的未解之谜[J].外国文学评论,2009(2):70-81.
- [3] Fludemik Monika “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 [M] // i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Ed. David Herman. Stanford, CA: LI 2003: 251.
- [4] 朱小琳·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暴力世界[J].外

国文学评论, 2009(2): 168—176.

- [5] Taylor—Guthrie Danille ed.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 [6] 艾周昌·非洲黑人文明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7] Du Bois W. E. B.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90, 138.
- [8] Kubitschek Missy Dehn. *Toni Morrison: A Critical Companion* [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8.
- [9] Phelan James. *Toward A Rhetorical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The Difficult, The Stubborn, and The Ending of Beloved* [M] //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9. 3&4, Patrick O'Donnell West Lafayette, Purdue Research Foundation, 1993.
- [10] Hooks Bell.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M].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140.

- [11] 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 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43.
- [12] Freeman Margaret H. “Poetry and the Scope of Metaphor: Toward a Cognitive Theory of Literature” [M] // in Antonio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Approach*.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3, 256.
- [13] Hogan Patrick Colin. *The Mind and Its Stori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210.
- [14] Otten Terry. “Horrorific Love in Toni Morrison's Fiction” [M] //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9. 3&4, O'Donnell Patrick West Lafayette, Purdue Research Foundation, 1993, 651—667.

(责任编辑、校对: 徐广联)

On the Cognitive Strategy of Alternate Narrative

—— Sethe's Infanticide in *Beloved* as a Case in Point

YU L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94)

Abstract: The alternate narrative, as a sort of extreme or unconventional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is likely to cause absence or distortion of the authorial encoding purpose in its reading, and hence failure to discern the overall cognitive script. This essay intends to focus on Sethe's infanticide in *Beloved* as an alternate narrative, with intent to exemplify the fact that the extreme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in literature does not solely accommodate literary concerns in its general sense; rather, it aims to realize the text's underlying encoding expectation by deliberately deviating from the conventionally stipulated cognitive scripts.

Key words: cognitive strategy; alternate narrative; Morrison; *Beloved*